

<<隋唐五代文论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<<隋唐五代文论选>>

前言

隋、唐、五代的文论，多数出自作家之手，它与创作的联系，较前代尤为密切。参照传统对文学的分期方法，同样可以把这一时期的文论划分为隋、初唐、盛唐、中唐、晚唐、五代六个阶段，其间发展变化的轨迹，大略可得而言。

魏、晋以后，文学逐步朝着重藻藻、对偶、隶事、声律的方向发展，文风日趋‘绮丽’。梁简文帝、陈后主以帝王之尊，提倡艳情诗，曾一度把创作引入歧途。但从整体上看六朝文学，诚如宋姚铉所说：‘虽风兴或缺，而篇翰可观。’〔一〕在文学发展过程中，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。

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了隋王朝，并进而统一全国，结束了东晋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，为南北文学的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但隋所承继的北周，是一个比较轻视文学的朝代，隋文帝也因袭了这一传统。这只要看一看以下事实，就可概见：北周文帝企图改革‘竞为浮华’的文风，极力推崇苏绰做尚书所作的大诰，并命令‘文笔皆依此体’〔二〕；再如当时著名作家如王褒、庾信、李德林、卢思道、薛道衡、虞世基等或来自梁、陈，或来自北齐，几乎无一出自北周和隋本土。隋文帝本人，又‘不悦诗书’而‘少文’〔三〕。

于是，在文学方面，与其所推行的‘躬节俭，平徭赋’的政策相适应，力主‘屏黜轻浮，遏止华伪’〔四〕，甚至把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而交付有司治罪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曾为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出谋划策而‘甚见亲待’的李谔所上的论文书，必然要希其旨意，痛诋文学创作了。

在李谔论文书中，批判齐、梁诗风之形式主义倾向，不无一定道理。但就这篇文章整体而言，它无异是一篇取消文学的宣言书。它不仅指责‘魏之三祖，更尚文词，忽君人之大道，好雕虫之小艺’，完全无视建安文学之业绩，而且攻击‘以缘情为动绩’，‘用词赋为君子’，对缘情的诗赋，不加区别地一概采取排斥的态度。这显然是逆潮流而动的文学主张。

正因为逆潮流而动，所以，对于遏制绮丽文风并未取得实际的效果。到了隋末，被人推为‘大儒’的王通，论文主张以儒家伦理道德和阐扬‘帝王之道’为旨归。但和李谔的见解是不同的。他并不否定文，而只是反对‘言文而不及理’；他不反对诗，而是提倡诗要‘约以则’，能反映‘民之情性’。

虽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，不符合当时文学的发展趋势，但毕竟与李谔的主张不同。正由于这一点，到了唐代，李谔的主张，罕为人所徵引；而王通其人及其论文主张，则常为人所推许或引用〔五〕。

足见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。

在隋代，顺乎文学的历史潮流而动的文论，应推后于李谔而先于王通的刘善经的四声指归一书了。此书已久佚，但在日僧空海的文镜秘府论中时见徵引。

由书名及文镜秘府论中四声论、笔札七种言句例、文二十八种病、文笔十病得失各节所引的资料看来，这无疑是一部有关声律病犯的著作。

上承沈约的四声，下启上官仪的笔札华梁，于近体诗格律的奠定，不无促进作用。尤其值得注意的，刘善经在四声指归里，还就各种文体的不同风格要求、艺术构思、文章结构等具体写作方法陈述了自己的看法，对于诗歌、骈文的发展，理应有其积极意义。

总的看来，隋代是南朝文论向初唐文论发展的一个过渡期，作为这一过渡期的代表作，应该是刘善经的四声指归。

至于李谔的论文书和王通的一些文学见解，在当时只是一种与文学发展趋势不相应的插曲而已。

<<隋唐五代文论选>>

内容概要

隋、唐、五代的文论，多数出自作家之手，它与创作的联系，较前代尤为密切。参照传统对文学的分期方法，同样可以把这一时期的文论划分为隋、初唐、盛唐、中唐、晚唐、五代六个阶段，其间发展变化的轨迹，大略可得而言。

魏、晋以后，文学逐步朝着重藻藻、对偶、隶事、声律的方向发展，文风日趋‘绮丽’。梁简文帝、陈后主以帝王之尊，提倡艳情诗，曾一度把创作引入歧途。但从整体上看六朝文学，诚如宋姚铉所说：‘虽风兴或缺，而篇翰可观。’〔一〕在文学发展过程中，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。

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了隋王朝，并进而统一全国，结束了东晋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，为南北文学的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

但隋所承继的北周，是一个比较轻视文学的朝代，隋文帝也因袭了这一传统。这只要看一看以下事实，就可概见：北周文帝企图改革‘竞为浮华’的文风，极力推崇苏绰做尚书所作的大诰，并命令‘文笔皆依此体’〔二〕；再如当时著名作家如王褒、庾信、李德林、卢思道、薛道衡、虞世基等或来自梁、陈，或来自北齐，几乎无一出自北周和隋本土。

隋文帝本人，又‘不悦诗书’而‘少文’〔三〕。于是，在文学方面，与其所推行的‘躬节俭，平徭赋’的政策相适应，力主‘屏黜轻浮，遏止华伪’〔四〕，甚至把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而交付有司治罪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曾为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出谋划策而‘甚见亲待’的李谔所上的论文书，必然要希其旨意，痛诋文学创作了。

在李谔论文书中，批判齐、梁诗风之形式主义倾向，不无一定道理。但就这篇文章整体而言，它无异是一篇取消文学的宣言书。它不仅指责‘魏之三祖，更尚文词，忽君人之大道，好雕虫之小艺’，完全无视建安文学之业绩，而且攻击‘以缘情为动绩’，‘用词赋为君子’，对缘情的诗赋，不加区别地一概采取排斥的态度。

这显然是逆潮流而动的文学主张。正因为逆潮流而动，所以，对于遏制绮丽文风并未取得实际的效果。到了隋末，被人推为‘大儒’的王通，论文主张以儒家伦理道德和阐扬‘帝王之道’为旨归。但和李谔的见解是不同的。他并不否定文，而只是反对‘言文而不及理’；他不反对诗，而是提倡诗要‘约以则’，能反映‘民之情性’。

虽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，不符合当时文学的发展趋势，但毕竟与李谔的主张不同。正由于这一点，到了唐代，李谔的主张，罕为人所徵引；而王通其人及其论文主张，则常为人所推许或引用〔五〕。足见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。

在隋代，顺乎文学的历史潮流而动的文论，应推后于李谔而先于王通的刘善经的四声指归一书了。

此书已久佚，但在日僧空海的文镜秘府论中时见徵引。由书名及文镜秘府论中四声论、笔札七种言句例、文二十八种病、文笔十病得失各节所引的资料看来，这无疑是一部有关声律病犯的著作。

上承沈约的四声，下启上官仪的笔札华梁，于近体诗格律的奠定，不无促进作用。尤其值得注意的，刘善经在四声指归里，还就各种文体的不同风格要求、艺术构思、文章结构等具体写作方法陈述了自己的看法，对于诗歌、骈文的发展，理应有其积极意义。

总的看来，隋代是南朝文论向初唐文论发展的一个过渡期，作为这一过渡期的代表作，应该是刘善经的四声指归。

至于李谔的论文书和王通的一些文学见解，在当时只是一种与文学发展趋势不相应的插曲而已。

二 在唐初文坛，佔统治地位的仍是南朝以来绮丽之风。

<<隋唐五代文论选>>

唐太宗李世民既位以后，以亡隋为监，励精图治，成为一代英主。

但他又酷好文学。

为了巩固其统治权，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反对‘无益劝诫’的‘浮华’文体〔六〕，并且在帝京篇里，以诗的形式直抒自己不‘释实求华，以人（民）从欲’的‘雅志’。

但在骨子里，他仍未摆脱绮丽文风的深刻影响。

他特意为晋书陆机传作后论，盛赞陆机‘远超枚、马，高躋王、刘，百代文宗，一人而已’；自己写的文章，要叫以文词‘绮错婉媚’著称的上官仪‘视草，又多令继和，凡有宴集，仪尝预焉’〔七〕；甚至作宫体诗要虞世南赓和〔八〕。

凡此等等，都可以看出唐太

<<隋唐五代文论选>>

书籍目录

<<隋唐五代文论选>>

章节摘录

近古皇王，时有撰述，并皆包括天地，牢能鬻有，兢采浮磕之词，争驰迂诞之说，骋末学之博闻，饰雕虫之小伎，流宕忘反，殊垒同致。

睢辩周蔦物，愈失司契之源，衡德百端，引掠全唐文校楠乖得一之旨。

皇上以天纵之多才，迺生知之教思，性舆道合，勤妙几神。

玄德渚通，化前王之所未化；贯己利物，行列圣之所不能行。

翰海、能庭之野，并为郡圆，扶桑、若木之域，咸纓冕。

天地成平，外内禔福，猎且为而不恃，睢休勿休。

俯协竟、舜，式遵稽古，不察貌乎止水，将取鑒乎哲人。

以为六籍纷纶，百家瞎胶，穷理书性，则势而少功，周览沉观，则博而寡要，故爰命臣等采摭摹书，翦截淫放，光昭训典。

圣思所存，榜乎政街，缀叙大略，成饗神衷。

雅致钩深，规摹宏达，纲要治礼，事非一目。

若乃钦明之后，屈己以救时；燕道之君，乐身以亡国。

或难而知惺，在危而狷安；或得志而骗居，业成以致败者，莫不借其得失，以着为君之难。

其委策名，立功榭惠，贞心直道，忘躯殉国，身殉百年之中，罄驰千载之外；或大巨猾，转日迴天，社鼠城狐，反白仰黑，忠良由其放逐，邦圆因以危亡者，成亦述其终始，以焉臣不易。

其立德立言，作训垂鲍，为纲焉纪，经天地，金声玉振，腾寅飞英，雅论微猷，嘉言美事，可以弘将名教，崇太平之基者，固亦片善不遗。

<<隋唐五代文论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